

## 世界文学的“火星”

——斯特林堡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赵白生

斯特林堡是瑞典的国宝。他的戏剧鬼斧神工，他的小说深入骨髓，他的自传石破天惊，他的一万多封书信翼翼独造。他对中国文化的特别研究，他对女性问题的敏感态度，他对科学实验的狂热献身，他对各国作家的深远影响，使他成为世界文学太空上的一颗“火星”。为了推动中国—瑞典两国的跨文化交流，促进创作界、学术界和翻译界的高层互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瑞典学院、瑞典驻华大使馆、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翻译协会于2005年10月19日—20日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斯特林堡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学院的资深院士阿兰教授（Sture Allén）、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拉尔富（Bo Ralph），还有瑞典驻华大使雍博瑞博士（Börje Ljunggren）、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管士光、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任吉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教授、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程朝翔教授、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乐黛云教授以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和学者九十多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赵白生博士组织了本次会议。

“中国作家论斯特林堡”是本次研讨会的重头戏。世界文学研究所致力于架设一个管道，竭尽微力让中国作家和外国文学进行有效沟通，每年都邀请著名作家来谈文论道。本次研讨会上，莫言、李锐、赵玫和余华个个有备而来，语惊四座。莫言深刻地比较了鲁迅和斯特林堡这两位大师，敏锐地指出了他们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他们都是孤独的战斗者，都是能够深刻地洞察人类灵魂的思想者，都是能够解剖人性的锋利的匕首。他们都有一颗骚动不安的灵魂，都是能够发出振聋发聩声音的呐喊者。他们都是旧的艺术形式的挑战者和新的艺术形式的创

造者。他们都是对本民族的语言作出了贡献的大师。他们都是真正的现代派、先锋派”。因此，他认为：“鲁迅是中国的斯特林堡。”在发言中，李锐指出，在斯特林堡充满戏剧性的写作生涯当中，最吸引人的是他把坚定的道义承担和不疲倦的艺术追求集于一身。对于死亡的反复表达，最为突出地体现了斯特林堡在艺术上的不懈追求，如《奥洛夫老师》等作品。另一方面，斯特林堡却又用自己的笔，坚持不妥协的批判，成为对全社会公开发言的坚定的公共知识分子，像长篇小说《红房间》。斯特林堡的时代是一个巨人如林的时代，但他还是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赢得了超出国界的广泛的社会名声。这名声不是对个人的奖赏而是对于良知的信任和尊敬。李锐最后以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结束：“我们如何面对斯特林堡们留给我们的遗产？”赵玫则从女性的立场对斯特林堡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她认为，斯特林堡对女性的贬低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此生与之有过婚姻的三个女人都是职业女性，是出于对职业女性的负气之言。在某种意义上，斯特林堡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是功利性的。他越是恨，也就越有了创作的激情和动力。另一方面，赵玫指出，斯特林堡看待女性的时候，更多的是公允的，甚至是欣赏的，有时候甚至充满讴歌。所以，对于斯特林堡来说，无论写什么，怎样写，女人始终是他创作的激情和动力。斯特林堡的作品富有自传性，而余华则顺水推舟用自己的经历来读解斯特林堡的《红房间》，发现天下作家灵犀相通。在余华看来，斯特林堡的夸张让他的叙述变得更加锋利，直刺要害之处；他的伟大之处在于，“需要优美的时候，斯特林堡是一个诗人；需要粗俗的时候，斯特林堡是一个工人；需要呆板的时候，斯特林堡就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会计师……然后他写下了众声喧哗的《红房间》”。

斯特林堡的国际影响是世界文学研究的关键课题。国际斯特林堡学会会长博耶·梅道尔教授（Björn Meidal）来自斯特林堡的母校——乌普萨拉大学。在他的主题发言里，他精辟地分析了“斯特林堡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他认为，斯特林堡既是最有瑞典特色的作家，也是最具国际特色的作家。尽管斯特林堡不能简单地用各种“主义”来概括，但他的作品还是清晰地表现为三个重要时期：自然主义时期、历史剧时期和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时期。他的众多代表作品对世界各国的大文豪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他们是法国的加缪、爱尔兰的贝克特、美国的奥尼尔、罗马尼亚的尤奈斯库和英国的品特等，难怪卡夫卡说：“我们都是斯特林堡的同代人，我们都是斯特林堡的接班人。”德国古腾堡大学阿尔弗雷德·霍农教授（Alfred Hornung）和科隆大学贝阿塔·牛麦峨教授（Beate Neumeier）分别考察了上个世纪斯特林堡在英国和美国被接受的情况。20世纪初，斯特林堡这位瑞典